

那年·那事·那人

改革开放40年宁波印记

# 幸福花开人安乐

## ——改革开放40年宁波城乡居民生活换新颜

“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十九大报告中这温暖厚重的宣言，一直镌刻在40年的风雨征程中。

改革开放40年，宁波实现了从商埠小城向现代化国际港城的伟大跨越，全市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20.17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9846.9亿元。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宁波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也进入“快车道”。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5656元，是1978年的181.9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871元，是1980年的139.1倍。

食品消费注重营养，高档耐用品升级换代，居住条件明显改善……40年，对于千千万万普通的宁波人而言，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物质与精神生活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陈江宁 王佳



▲金婚老人乘婚车感受新宁波。(丁安 摄)

▲我市老小区加装电梯启用。(丁安 摄)

▶“洗脚上田”的农民在乡镇企业工作。(资料图片)



▲日益繁荣的农村集贸市场。(资料图片)

与全国改革开放同步，宁波的改革从农村起步。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等为主要内容的改革的推行，促进了20世纪80年代宁波农村经济的增长，农村居民的“钱袋子”随之鼓起来。

1985年，宁波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27元，比1980年的222元增长近2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新变化，由20世纪70年代末吃、穿、用、住，逐渐转变为吃、住、用、穿。1985年，宁波农村人均住房消费支出119元，占生活消费支出比重21.1%；同年，人均住房面积达到21.3平方米，比1980年增加17.1平方米。

耐用消费品大量进入农村居民家庭，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老四件”逐步普及，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开始在农村露面。1990年末，平均每百户已拥有自行车184辆、缝纫机75架、手表270只、电风扇163台、电视机73台、收音机34台、收录机27台、洗衣机11台、电冰箱18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宁波及时、果断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而一系列工资改革促使职工工资收入普遍增加。1979年，政府第一次对职工发放了副食品补贴，同时，机关、企事业单位中40%职工调整了工资。

1985年，工资改革后，城镇职工的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不再局限于基本工资，出现了奖金、津贴、车贴、价格补贴、书报费等等收入。1987年宁波实行计划单列，企业职工人均增资1.8元，同时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职务工资制。个体职业、第二职业的兴起进一步提升了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

这一时期，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迅速提高。1990年，宁波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628元。吃讲营养，穿讲漂亮，住讲舒畅，成为众多城镇居民家庭的需求趋向。

在食物消费方面，肉禽蛋、糕点烟酒、瓜果的消费支出明显增加。衣着消费不仅考虑保暖，更讲究穿好、穿美。1990年末，宁波城镇平均每1.5人拥有一件呢大衣，每人有1.6件毛料服装。耐用消费品拥有量逐年上升，1990年末，在宁波城镇，平均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60台、洗衣机76台、电冰箱88台、收录机83台、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电风扇、黑白电视机等基本达到饱和。

在物质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增多，人民生活日益丰富多彩。1990年，人均购买书报杂志、用于文娱活动和支付学杂费的支出达174元，比1985年的72元增长1.4倍。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国民经济转入快速发展轨道，宁波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

宁波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由1990年的1963元增加到1995年的7275元，5年间增长2.7倍，年均增长30.0%，扣除同一时期价格上涨因素，年均实际增长10.7%。这五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最为快速的一个时期。其中，1993年、1994年连续两年，实际增速20%左右，为宁波历来所罕见。2001年，宁波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万元。

城镇居民收入迅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多元化趋势逐步显现，财产性收入成为宁波居民收入新的增长点。1995年，户均净存储蓄存款2314元，净购入有价证券316元，两者合计比1990年的475元，增长4.5倍，同期城镇居民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增幅高达5.0倍；2003年，财产性收入人均又比1995年增长4.9倍。职工从单位得到的收入在人均实际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由1990年的80.5%降至1995年的74.4%。转移性收入亦快速增长，2003年，转移性收入人均2886元，比1995年的976元增长近2倍。

作为衡量生活水平重要指标的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由1990年的56%降至1995年的48.6%，1998年降至39.5%，2003年进一步降至38.0%。食品消费由“温饱型”进入“小康型”，由量的满足向质的提高转变。在食品消费构成中，水产、肉禽蛋等副食品和鲜果比重逐年上升，1995年到2003年，人均粮食购买量由84.0公斤下降至70.8公斤，肉禽蛋由25.2公斤增至45.3公斤，奶制品由7.8公斤增至27.2公斤，鲜果由25.1公斤增至31.3公斤。水产品由26.9公斤增至94.6公斤。衣着消费日益讲究时尚，突出个性，衣着成衣化、时装化趋势明显，真皮、全毛、全棉制品大受青睐。

高档耐用品迅速升级换代，彩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新四件”基本饱和，开始向空调、电话、录像机、组合音响过渡。居住条件显著改善，1995年末，71.5%的城镇居民家庭住上配套式单元房，独立厨房户比重达95%，使用液化气户比重上升到98.5%。邮电通信事业的迅猛发展，使居民装电话难现象有了根本改观，1995年末，宁波平均每百户家庭电话拥有量达到72部。

人们更加追求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文化、教育、娱乐、旅游等开支大幅增长，1995年宁波人均旅游支出86元。这一时期，拥有16个

频道的有线电视网在市区基本普及，钢琴、电子琴、书法等培训成为智力投资新热点。

20世纪90年代，农村改革以市场为突破口，全面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式纳入宪法。国家进行了新一轮价格改革，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进一步放开农产品市场。1992年8月，宁波市委提出“提前三年实现农村小康”的战略目标。这些政策的调整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宁波农村经济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个高峰。

农民收入增长开始走出低谷，1995年，宁波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484元，相当于1990年价格水平的1569元，高于1992年国家统计局提出的人均1200元小康量化标准。农村居民储蓄存款由1990年的18.51亿元猛增至1995年的74.75亿元。

民营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春天。宁波大胆推行以明晰产权为核心的乡镇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极大激发了企业的发展活力和做大做强的内在动力。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乡镇企业从业人数由1990年的83.7万人增加到1995年的115.7万人，同时拓宽了农村居民增收渠道。1995年，宁波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当年纯收入比重34.9%，2001年提升至47.3%，首次超过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

这一时期，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新建的房屋，相当部分已是设施齐全、美观舒适的城市化住房。1995年末，宁波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1.3平方米。其中，钢木结构住房比重达到93.1%。1996年至21世纪初，宁波逐步调整完善村镇规划，引导农村住宅逐步向中心村和小城镇集中，大量农村居民搬入新居；2003年末，人均住房面积提高到46.86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比重达到43.9%，比2000年的35.8%提高8.1个百分点。

进入新世纪，宁波经济进入平稳较快增长阶段。宁波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民生建设，把全面改善民生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提升城乡融合发展。城乡居民的综合生活质量全面提高。

2017年，宁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5656元，为全国的1.53倍，是1978年的181.9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871元，为全国的2.30倍，是1980年的139.1倍。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位居15个副省级城市第二和第一。2017年，宁波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为1.8:1，低于全国平均的2.71:1。

“像进口水果、海鲜，在过去，特别是困难时期，那是想都不敢想的。”翻看居民的账本，国外旅游支出、天然气费用、移动电话费等，都是新的重要支出内容。

令城乡居民欣喜的是，民生的保障与改善是全方位的。

社会保障体系持续完善。基本建立全市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017年末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429.6万人、380.8万人、269.3万人、330.9万人和266.2万人，城乡三项医疗保险参保率超过95%，大病医保制度实现全覆盖，医保待遇水平居全国城市前列。

教育医疗卫生事业蓬勃发展。1978年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90.2万人，2017年在校学生增加到131.6万人。基本构建覆盖城乡、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各区县(市)全部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评估认定。普通高校从20世纪80年代的5所发展到16所，全日制普通高校在校生达到15.6万人。医疗卫生服务稳步提升，基本形成覆盖全市的城乡公共卫生管理网络体系。2017年拥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4157个，是1978年的4.38倍。

环境质量总体趋好。2017年，城区空气优良率达到85.2%，环境空气质量按综合指数计算在全国74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17位。持续推进“五水共治”，完成饮用水源保护、工业重污染行业整治、落后产能淘汰等重点任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政村覆盖率达到90%，率先创建“污水零直排区”。

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落后走向文明。40年风雨征程，作为“过来人”，众多宁波人会体会到，是改革开放让所有普通老百姓的幸福、获得感与日俱增。

### 史志传声

#### 市委党史研究室召开会议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10月23日，市委党史研究室召开党建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部署会，并开展了《党章的发展历史和现实启示》廉政党课。

会议部署进一步落实党建增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坚定不移落实“两个维护”，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落实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严格执行个人事项报告制度，规范准确填报个人事项，严肃对待查核处理；不断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强化绩效考核监督，推动绩效考核运用；提高服务效能意识，健全述职评议制度，不断提高机关执行力；抓好主业检查和落实，推进党建主体责任落实，推动党史地方志工作再上新台阶。

#### 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主题党日活动

10月24日，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开展“学回信、悟初心、明底线”主题党日活动和警示教育。

上午，在宁波市法纪教育基地，通过参观廉政警示厅、观看服刑人员的忏悔反思视频等教育活动，市委党史研究室全体党员对把好人人生“六道关”有了更深刻的领悟，表示要以案为鉴，时刻警醒自己，鞭策自己，不断增强

自身防腐拒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下午，党员们在浙东红村横坎头村参观了家书馆、家园馆，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回信中的重要精神内涵，全面了解横坎头村的发展历程，一致认为要把总书记回信精神转化为“编史修志”的强大精神动力，传承好红色基因，讲好宁波故事，为宁波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 基层志书编纂研讨会在奉化溪口举行

10月25日至26日，宁波市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和家(族)谱志专题研讨会在奉化溪口举行。

研讨会采取大会交流与分组讨论形式，对乡镇村志、家(族)谱志的编纂理论、工作方法、体例范式等进行探讨。会议从宁波基层志书发展实际出发，站在历史、全局和战略的高度，

分析了基层志书编纂工作的形势和现状，指出基层志书编纂应注意的问题，并就如何组织开展基层志书的编纂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其间，参与研讨的与会人员考察了溪口镇石门村、岩头村的家(族)谱志编修现场和村史展览，近距离学习和交流基层地方志编纂工作。

#### 《宁波纪事1911—2014》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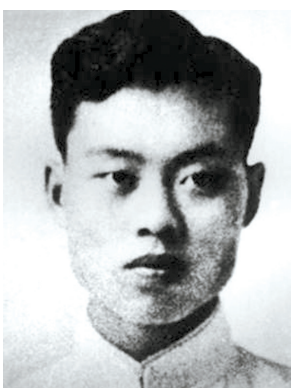
近日，由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宁波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纂的《宁波纪事1911—2014》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依次分为《大事记》《文献选录》《人物》三部分，记述发生在宁波地域的重大事件、

活跃于全国各地的宁波籍或与宁波有关非本籍人士的人物传记以及部分相关的文献资料等。全书共收录人物723位、专题文献14辑72件，所有录入事件均注明资料来源、传主随附照片或画像，以保证内容的可查、准确、完整。

### 红色记忆·宁波英烈

#### 朱镜我：为党的宣传事业奉献一生



朱镜我(1901—1941)，原名朱德安，又名朱得安，笔名镜吾、谷荫、朱怡庵、张焕明等，出生于鄞县(今鄞州区)朱家峰村。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加强国内革命文化工作，在日本攻读社会学、研究马列主义的朱镜我，应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元老成仿吾之邀，于1927年10月返回上海。

在上海，朱镜我与其他革命文化工作者一起，展开了颇有声势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和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活动。他翻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首次在国内发行；先后主编了《文化批判》《思想》月刊，撰写了《理论与实践》《科学的社会观》等一系列论文。在此期间，朱镜我在上海艺术大学、中华艺术大学、上海政法学院、政法大学和中国共产党举办的华南大学等校担任教授，讲授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发展史，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8年5月，朱镜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党的文化支部组织委员，参加了中央宣传部文化党团。1929年，担任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简称文委)委员，成为左翼文化领导人之一。

1941年2月，上海中央局第三次遭到破坏，朱镜我等人在上海法租界被捕。面对威逼利诱，朱镜我坚贞不屈，坚持革命立场，始终不为所动，经过两年多的牢狱之苦，1937年6月，经党组织全力营救出狱。出狱后，朱镜我不停奔波，联系了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坚持下来的老党员和一部分从狱中获释、经受过考验的革命同志，于1937年9月在宁波建立了中共宁波临时特别支部(后发展为浙东临时特委)，并任书记。在他的努力和坚持下，宁波地区中止了多年的党组织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同年11月，朱镜我在杭州指导筹建成立中共浙江省委临时工作部。后又调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皖南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第一任部长兼军刊《抗敌》杂志主编等。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朱镜我抱病随军转移，13日，部队被困在石井坑虎云崖山头，为了让部队迅速突围，朱镜我战斗到为共产主义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壮烈牺牲，时年40岁。

除署名外本版图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